

文化批評與副刊在台灣

作為「真正」政治的文化政治及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¹

前言

這篇論文源自筆者於1993年1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文化批評國際會議」上發表的 "Cultural Politics as 'Re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as Applied Philosophy : Cultural Criticism in Taiwan. (現場僅以英文發表第二節)。

本文分析了台灣在解嚴後的短暫狂飆年代，反映了報紙副刊的性質由文學副刊轉向文化副刊。然而在社會政治情勢隨著李登輝牢固掌權而穩定下來後，文化批評性質的副刊功能開始被民意論壇（讀者投書投稿）所取代，副刊又逐漸恢復為文學副刊。但是這不表示文化副刊只是轉移陣地，改換到民意論壇的版面而已，畢竟，由於民意論壇的特殊時事現實性質與「新聞性」性格，使得之前文化副刊那種帶有烏托邦色彩、超現實（但又貼近現實）性格、不受限於現實邏輯、主流思惟邏輯、或純粹邊緣（甚至干犯眾怒）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事實上，媒體民意論壇板雖然有某種自由化的公共論壇性質，也確實是之前報紙媒體所無的，但是它畢竟排除了某類文類。這也是台灣公共論壇的危機。除了說明文化批評在台灣當時的發展外，原文也約略提及上述那種文化批評在哲學領域的可能發展。（2017年註：筆者在1990年代寫作本文的時刻仍期許台灣哲學能從「應用哲學」這樣的名目開展出在地的學問與對現實的介入，而當時也確實有跨學科跨領域學問興起的趨勢，文化研究的出現就是徵兆之一，但是各學科

¹（2017年註）此文寫於1990年代初期，中文全文從未發表過。現今原封不動地收錄於本書，相信有助於人們對於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的文化氛圍、「文化左翼」與報紙副刊演變的深度了解。

本位思考的保守力量仍然強大。加上當時台灣同時出現學術愈趨專業化的浪潮，故而台灣的西方哲學基本走向仍是追隨當代西方哲學的問題架構與解決）。

就在台灣解除戒嚴後一年，1988年左右，一種被視為和西方學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相關的文化批評開始出現在台灣較次要報紙副刊上，這種新型的文化批評很快地進入主要的報紙以及知識份子的雜誌並成為時髦與顯赫的文類。後來，這種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不但在學院中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正當性，而且還為台灣當時新興的社會運動提出了新的參與政治的方式（signify an alternative politics）。

這篇論文將試圖為上述文化批評的發展及其意義，以及這種文化批評的政治，提供一個說明。羅蒂（Richard Rorty）曾主張文化政治和「真正」政治是有區分的，本篇論文則認為，正如文化批評／文化研究在台灣的發展所顯示的，究竟有無此一區分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問題是：懷有政治動機的知識份子怎樣去取用或挪用（appropriate）文化批評，以進而創造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以及文化導向的知識份子如何去取用或挪用政治批評，以擴展他們的文化空間？不過，筆者要強調，文化政治不會自動成為真正政治，而真正政治也不必然會構成文化政治；文化政治與真正政治的關係必須透過論述實踐才能串連在一起，（「串連」articulation並不只是串連，而是有意義的串連或接合）²。這篇論文的很大一部份即是要說明文化批評在（1）台灣反對黨（民進黨）與新社會運動之間的複雜關係此一脈絡、以及（2）台灣報紙副刊角色的變化此一脈絡下的串連政治。

除了說明文化批評在台灣近年來的發展外，本文也將約略提及上述那種文化批評的未來可能發展。在台灣，進口並拓展文化研究的「火車頭」主要是英文系的成員，但是這些人的努力卻常因搞文化研究的正當性問題而打折扣，因為英文系成員在解釋自

2 關於「串連」這個詞的詳細解說，可參看機器戰警，頁8-12。

己為何做本土文化的文化研究時會遇到正當性的問題，畢竟，本土文化和英美文學及文化看來沒有多大關連。

當然，台灣英文系應當繼續為在本學科內做文化研究之正當性而努力奮鬥，不過在台灣學術界中還有另一種方法可能有助於文化研究之正當性，亦即，拓寬文化研究的基地，使文化研究成為名符其實的跨學科實踐。要拓寬作為跨科系學術的文化研究，就必須說明（articulate）為什麼其他學科也有需要做文化研究。本文將提議：台灣的哲學系或研究機構若開始進行作為一種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或將對台灣的哲學研究有益。這樣一種應用哲學不但可能促使哲學界把進口的西方哲學放在本土的視野中，同時，由於中國哲學一向強調文化在做哲學時的重要性，本文建議的這種應用哲學也可以提供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對話的機會與場合。

文化政治與真正政治

首先，讓我們來檢視文化政治與「真正」政治之間的區分，並且批評羅蒂對這一區分的相關說法。羅蒂在最近一篇題為"*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Too Far In ? Too Far Out ?*"的文章中批評美國文學研究界中的「後結構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為學術的孤立主義者。羅蒂認為，文學研究這批「後」派或左派和傳統的左派不同：傳統左派的問題是他們「自外於〔美國的〕……自由主義文化」（*Objectivity* 15），但是他們至少還參與了美國的政治；可是文學研究這批人卻犬儒地自外於美國的選舉政治（"*Intellectual*" 490）。在此我們可以看出，羅蒂所謂「真正政治」就是選舉政治；在選舉政治中，人民被召喚為「民主政體中的公民」（"*Intellectual*" 490），而選票、報紙、社區組織則是「民主社會中的建制」（"*Intellectual*" 489），以選舉政治為中心來解決社會的病痛。在這樣的前提下，羅蒂堅持「真正的、選舉的政治，與文化或學術政治間……有一區分」（"*Intellectual*" 488）。此外，對羅蒂而言，學術的自主性正繫於這一區分，因為

學術政治若和真正政治混淆，將危及學術的自主（*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228-9）。在這樣的脈絡下，羅蒂正確地結論：「〔那些文學研究的人〕想藉著重新定義什麼是政治，以使校園成為真正政治行動之所在，這是無用或白費力氣的」。（"Intellectual" 490）

在這一點上，台灣的「文化左翼」（廣義的）可能會同意羅蒂的結論，雖然他們所根據的理由與羅蒂不同。對台灣的文化左翼而言，僅僅將文化領域重新定義為政治領域，確實是行不通的。但是文化左派認為，「真正」政治的場所必須延申並衍生到知識生產的場所、商品生產的場所、文化再生產的場所、身體和性別再生產的場所等等；同時，後面這些場所中特殊的權力問題也要進入政治的傳統場所（如國會、選舉、政黨、政府等等場所），這樣才能使傳統政治的功能不再侷限於傳統政治領域之內的權力分配（參看陳光興192-196；迷走ix-xi、55-59；傅大為7-20、38-41、75-82；機器戰警495-501）。

羅蒂對民主與政治的看法可能深受傳統「改良政治（布爾喬亞民主或議會民主）vs.革命政治」這種二分架構的影響，而羅蒂也頗為自覺地站在改良政治的立場。像這樣二分法下的特定立場容易使羅蒂忽略一些可能對邊緣團體有利的非正統形象與策略，因為這些形象與策略不見得隸屬於改良政治或革命政治。羅蒂在批評李歐大（Jean-Francois Lyotard）時注意到，對英美的知識份子來說，「嚴肅」或「玩真的」政治是改良政治，但對法國知識份子像李歐大等來說只有革命政治才是玩真的、真正的政治；羅蒂進而暗示李歐大等的革命政治姿態其實只是「知識份子的愛現（愛顯擺）」（*Objectivity* 221）。羅蒂在此完全否定「知識份子的愛現」有可能效用，他沒有考慮到有時候「知識份子的愛現」作為一種激進的邊緣聲音也可以是一種策略，可以有吸引、召喚或甚至動員邊緣社會團體的功能因而成為一種真正的政治行動。

在另一處，羅蒂也似乎認識到：「〔對革命〕的想望渴求……也許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憤怒的產物，即，由於邊緣社會

團體不太可能像其他人那樣得到希望與解放，由此而生憤怒」（*Objectivity* 16）。因而，即使非改良政治的策略、或選舉政治以外的策略（就像羅蒂暗示的那樣）是無用的，或僅是知識份子的愛現，羅蒂的選舉政治主張是否能符合邊緣團體的需要，這才是關鍵問題，否則改良政治（選舉政治）和革命政治對邊緣團體而言都是一樣的。事實上，由於邊緣團體擁有的政治資源通常很少，我們實在看不出來為什麼邊緣團體總是應該參與在選舉政治中；畢竟，參與選舉政治會消耗邊緣團體有限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大可用在其他地方（像草根組織等等）。照這樣說來，邊緣團體至少在參與選舉政治的時機上應有彈性，參與改良政治或選舉政治此一策略對某些社會集團而言不應是唯一的或絕對應採用的策略。

更有甚者，如果就像羅蒂所主張的那樣，只有選舉政治才算「玩真的」，那麼在議會民主或公平選舉均不可能的情況下，是否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呢？還是說，在這類情況中可以有參與選舉政治以外的政治策略，而且這些策略也可能是「玩真的」，即，有真正的政治效果？很明顯地，當選舉政治（不論公平與否）無法改進或甚至削弱邊緣團體的權力地位時，邊緣團體可以運用其他可能改進自身權力地位的政治策略。當然，文化批評便可能是政治策略的一種。

簡言之，當參與「真正」或傳統選舉政治的正式管道對某些集團不開放或不利時，文化批評就有可能是一種重要的政治批評形式，而文化政治便可能導向真正的政治。現代中國的歷史其實充滿了這類例子：像中國共產黨（或黨內的派系）不論在1949年革命前或後的一些政治鬥爭，或者日本占領台灣期間台灣文化協會的政治鬥爭，都經常採取文化政治的形式。在近期的台灣歷史裡也有不少類似例子，像作家李敖的文化論戰與入獄事件，或者有關鄉土文學的論戰，在這些例子中，文化批評與政治鬥爭的界線、文化政治與真正政治的界線，都不是絕對確立的。事實上，在以上例子裡的有關當局（共產黨或國民黨）均正確無誤地認出

文化政治其實是真正的政治，而且把文化批評當作政治行動來處理³。正如某小說家所言「…在台灣地區，一切活動只要牽涉文化就可能牽涉政治」（孟樊與林耀德 478）。

以上有關文化政治與真正政治之關係的一般性討論將作為以下我們觀察台灣新興的文化批評與（廣義的）左翼政治之關係的參照背景。下面我將簡略地描繪這個文化批評的發展過程，我的描繪將無可避免地有些簡化，也將對台灣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境況有大膽的詮釋，但是我希望我的說明至少能掌握台灣近年來文化批評之發展的一般傾向。

副刊與文化批評的興起

在過去，對通俗文化、通俗意識形態、俗世的日常生活文化現象、以及聳動的社會事件等的批評與分析，通常不是沒有什麼智識價值的膚淺觀察，就是道德說教，唯一的例外也許是對愛情浪漫小說與武俠小說這種通俗文學的文學批評。但是這些小說之所以引起批評者的注意，乃是因為它們的通俗文學地位或性質有疑問：在武俠小說的例子中，批評家想要勸服人們，武俠小說應當被看作有文學與文化價值的嚴肅文學，而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說；而在浪漫愛情小說的例子中，批評家通常只注意那些看起來有嚴肅文學形象的小說。換句話說，在過去，批評家對真正道地的通俗文化並沒有興趣。

通俗文化之所以被認為不值得批評家嚴正地注意，有兩個原因。首先，對通俗文化、通俗意識形態、俗世的日常生活文化現象、引人注目的社會事件之批判性研究與理論性批評，並未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可以從事的正當事業；通俗文化在過去根本不能進入知識份子高等文化的言談中。其次，即使有知識份子想要從事通俗文化的批判性或理論性研究，這種非傳統的文化批評也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在學院外，這類文化批評沒有媒體可供發表

³ 這樣的講法並不表示有關當局的作為是對的或有道理的，而僅是認為有關當局並非愚昧到分不清文化與政治的區別。

（例如報紙的影劇版、娛樂版或副刊，過去都不太可能刊載通俗文化的理論評論）；在學院內，這類文化研究是否能算作學術成績也大有問題。

大約在1988年左右，一個重大的變化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化批評——批評焦點集中於真正的通俗文化、（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通俗意識形態、俗世的日常生活文化現象、或引人注目的社會事件，而且經常用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心理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批判理論性的術語及概念作為其批評語言——開始在報紙的副刊出現了。事後來看，我們可觀察到使這個變化產生的數個因素都和後戒嚴時代的副刊角色變化有關⁴。由於副刊的歷史角色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我將只處理和新文化批評興起的相關層面。

1970年代以前，副刊在塑造台灣文化方面只扮演了一個宣傳的角色。在這個階段，副刊基本上配合了新聞管制的國家政策，副刊上的文學作品此時大多由成名作家供稿，這些作家則是在專門的文學雜誌上養成與出名的。從1970年初開始，迅速成長的台灣經濟使報紙轉形為文化工業的主要面，而副刊由於其廣泛的接觸面與訴求，逐漸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取代了一度代表文學社群之實踐的文學期刊或雜誌的主宰地位（林耀德，〈「聯副」四十年〉 11；向陽 183）。文學與印刷大眾媒體（即，報紙副刊）這樣的結合，使台灣文學產生了顯著的變化，而且在很多人眼裡，這種結合也是後來「嚴肅」文學墮落的部份原因。無論如何，此階段的副刊基本上是文學性的，刊登的是小說、短篇故事、詩、散文，偶而也有關於文學活動或文學家的報導或新聞、文學作品的評論等等。

當臺灣在1970年代的後半開始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重新構造時，文化領域也經歷了實質的改變。作為台灣兩大報之一的《中國時報》首先更新其副刊的形態，在該報副刊主編高信疆

4 對副刊的研究近來已被認為是台灣文學社會學的重要部份。參見林耀德〈「聯副」四十年〉，頁11。

（他被公認為是整個台灣副刊形態變化的關鍵人物）以及繼任主編金恆煒⁵的主導下，《中國時報》原來傳統的「文學副刊」或「文藝副刊」逐漸轉變為「文化副刊」（鄭貞銘 68）。鄭貞銘並指出，文化副刊在以下四個特質上不同於文藝副刊：（1）文化副刊的範圍與內容從純文學擴展到社會與文化；（2）文化副刊在表現形式上不斷創新——採用座談會、集體專訪、報導文學、文學獎等，並在編排上著重版面的視覺效果；（3）文化副刊的編輯不像文藝副刊時代一般只要負責選稿、發稿即可，而是配合新聞性主題，主動策劃版面、邀稿，即所謂的「計劃編輯」，故而編輯的角色變成副刊內容呈現的主宰者；（4）文化副刊變成知識份子的公共論壇（public sphere），新副刊成為知識份子（而不只是文學人）表達意見的場所，也因而間接參與了社會事務（鄭貞銘 68）。很明顯，副刊性質的改變對台灣的知識與文化生活有巨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聯合報》的副刊雖然也部份採用了上述文化副刊的特點，特別是呈現形式的多樣化，但是其內容基本上仍堅決地保留為文學或文藝副刊。作家向陽則觀察到，《聯合報》的文藝副刊與《中國時報》的文化副刊之間是對立的（191）。本文同意這個對立的觀察，但是有兩點重要的補充：

第一，即使在1970與1980年代《中國時報》的文化副刊，「純」文學仍是副刊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⁶。

第二，文化副刊中所謂的「文化」在這個階段仍然指著高等文化，通俗下層文化（像因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造勢而崛起的素人畫家洪通這類例子）如果出現在副刊中，也多半「是被當代通俗文化本身所摒棄的通俗文化老舊而瀕臨滅絕的類型，這種

5 在高信疆與金恆煒之間尚有陳曉林與王健壯擔任主編，但在位時間較短。參見《文訊》編輯室，〈各報副刊歷任主編名錄：民國34年-75年〉頁92-93。

6 林耀德則認為「純文學」在被副刊版面重塑、加框之後也會產生嶄新的意義／無意義形態。林耀德以1978年10月3日的彩色副刊版面為例，指出雖然內容是「時報文學獎」的獲獎小說，但是插畫卻喧賓奪主，小說正文則為了插畫而存在。該日副刊其實是一張彩色文化海報，文學業已消失（〈「鳥瞰」文學副刊〉，頁382-384）。

將『被摒棄的通俗文化』吸收再生的行動，是中上層文化擴充、修補本身範域的典型模式之一」（林耀德，〈「鳥瞰」文學副刊〉386-387）。總之，對道地的通俗文化、通俗意識形態、俗世日常生活的文化現象等有理論背景（theoretically informed）的批評尚不能真正地占有一席之地。

台灣當局在解除戒嚴之後，又在1988年解除了報禁，這更加速了副刊性質的變化。就本文所關注的層面而言，《中時晚報》副刊的出現是個顯著的發展。在主編羅智成的主導下（創刊起初的主編為張大春），這個副刊成為形式上最活潑的副刊，而且成為名符其實的文化副刊。在這樣的文化副刊上，文學不再是重要的一元，各種評論或雜文（但不都是很有深度或理論背景的）取代了文學作品。這表徵了文化副刊與文藝副刊對立鬥爭發展上的一次決定性勝利，對緊接後來的副刊發展有很大的衝擊。

就在同一年，《自立早報》創刊問世了。其副刊主編劉克襄，以及後來（當劉克襄離開自立早報後）實際扮演重要編輯角色的顧秀賢，均和《中時晚報》時代副刊一樣採用了積極的文化副刊政策，甚至和過去一向著名的《自立晚報》之本土副刊相當不同。和當時台灣的其他副刊相比較，《自立早報》的副刊有以下三個獨特的方面：

第一，雖然「純」文學在剛開始時仍有重要或主要的地位，但是社會政治層面的關懷則不斷加強，許多文章明白地關切著社會運動或社會政治情況。另外，和《中時晚報》的時代副刊一樣，《自立早報》的自立副刊包含了許多社會批評、文化批評、理論性文章、學術新聞、媒體批評、海外的知識或文化訊息、以及政治評論。

第二，《自立早報》的自立副刊具有強烈的智性風格，有時尚有準學術的風格。這應是受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金恆煒主編時期的影響（參看林耀德，〈「鳥瞰」文學副刊〉389）。值得一提的是，金恆煒也非常強調副刊的社會參與（金恆煒 122-126）。不過《自立早報》副刊似乎是所有副刊中最智性的，其刊

載的文章對一般讀者而言相當地玄奧、充滿術語。傅大為在描述自立副刊此一特色時，曾將這個特色連繫到副刊的邊緣位置。他說：

副刊並不如今天一般報紙的二三版討論的是所謂的國家的政經大問題，它也較少有今天所謂的學者或大主筆們在其中亮相（無論是自由或保守），它是大問題、大名字的邊緣，它是副。……一般報紙二三版（自立報系等亦不例外）中熟悉的文字與概念……常是相當局限的。……副刊上的文字概念經營比較沒有這種限制，它可以是比較怪、隔離、看不懂，在今天，許多學生型的報章雜誌與地下刊物也有類似的效果，這是它們自由發揮的空間。就這個意義而言，自立副刊的許多文字概念的經營和學生地下刊物的距離反而較接近。但這不是貶低它的意義，明顯的，那是另一種次文化。……那個發展於邊緣的次文化是前衛，大概沒有問題。（83-84）

這樣說來，自立副刊是雙重的邊緣——副刊相對於報紙二三版的邊緣，《自立早報》相對於其他大報的邊緣。更有甚者，自立副刊的智識性與學術性有一種次文化的氛圍及激進的可能性（亦即，傅大為所指的「前衛」）。

第三，自立副刊使台灣的文化左派在大眾媒體中插進一腳，而這主要是由於劉克襄的開放編輯政策。由於這些文化左派寫手多是從「新」社會運動的視角出發，而新社會運動的目標和**反對黨的國家主義政治**又不盡相同，所以大眾媒體中總算可以聽到一個微弱但激進的聲音，既不同於兩大政黨，亦不同於自由派陣營。

於是，一種新型的文化批評開始出現於自立副刊以及其他副刊中。不過，這種文化批評的**作者並不限於文化左翼**，其確切的性質也將在下面逐一澄清；但是在此讓我們先指出，新型的文化批評雖然有時激進，可是仍然受到好評，而且受到許多副刊的歡

迎，我認為有三個原因促成這樣的狀況。

首先，在文藝副刊轉變為文化副刊的過程中，台灣報紙副刊變得相當多元化，因此可以容納非傳統的文化批評。換句話說，副刊本身的多元化是新文化批評之所以可能存在於副刊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新文化批評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還滿足了讀者的某些需要：在副刊形態轉變的這段時期，台灣社會構造的急速變化所釋放出來的社會力量需要出口，新文化批評中激昂的聲音可以召喚某些被壓抑的主體（詳見下一節）。同時，對於副刊的一般讀者而言，由於他們向來對帶有批判性「反省品味」的資訊和觀點有興趣（參見汪芸），新文化批評也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根據汪芸的分析，副刊的主要讀者是新中產階級，由於未能躋身上層階級，於是開始向副刊的評論專欄、社會觀察文章及讀者來函版面尋求對現狀的挑戰和反省。這些反省逐漸為新中產階級所吸收，並在接觸或出席關係較接近的初級團體（家人、朋友、同事）和人際距離較大的次級團體（同業組織、社團）時，用來引述和佐證自己的觀點。對新中產階級而言，這種做法如同替自己貼上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文化標籤而獲得洞察力和批判力以超越同儕的滿足感。總而言之，在讀者對批判反省文字的需要下，在多元化副刊給予了有限的空間後，新文化批評得以在副刊立足。

新文化批評被迅速且友善地接納的第二個原因是這樣的：和通俗文化、通俗意識形態、俗世日常生活的文化現象、流行社會話題等有關的文章在過去副刊也曾出現過，而有理論背景（theoretically informed）甚至準學術性的評論在副刊上更不乏先例，但是副刊都曾刊載過它們而被批評（參見劉紹銘、林海音在「報紙副刊何處去？」座談會上的發言紀錄）。報禁解除後不但新報紙出籠，報紙也可以增張，相對地對稿件的需求量增大，邀稿對象也須擴大，而邀稿內容更不可能侷限於文學；反而因為報紙競爭，那些流行通俗或具有現實性的話題較受到歡迎。在這樣的情形下，副刊編輯便很難做到張繼高在「報紙副刊何處去？」座談會上所呼籲的「[副刊編者]要注重選擇，選擇值得尊

重的知識份子到報紙上來。另一方面，我們要傳播那些值得傳播的東西，儘量避免傳播粗淺的東西……希望今後的副刊多尊重『精緻文化』的傳播」。由於需要稿件，所以一些（從過去眼光看來）「不值得尊重的」知識份子現在也有機會在副刊寫作，她／他們的頭銜當然不是什麼「值得尊重的」教授或名作家頭銜，而是十分可疑的「文化工作者」、「自由作家」、「××運動工作者」等等，其筆名也出現了千奇百怪的、「無法使人尊重的」假名，像什麼伊能動、閃紅燈、白賊七、爬蟲類、機器貓小叮噠等，可是文章內容卻可能是相當智性的，處理的話題則常是通俗文化、通俗意識形態（不論是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意識形態）、社會政治議題或事件等；而編輯之所以邀這些人寫稿，也往往是因為她／他們能夠針對上述流行話題發言，而這些人之所以願寫，也是想在後戒嚴時代爭奪詮釋權。總之，由於報禁解除後，副刊需求新稿源與需求吸引人話題的稿件。在需要新寫手與流行話題的情形下，新文化批評便應運而生了。

文化批評之所以能迅速在副刊立足的第三個原因，也和第二個原因的背景分不開。在副刊編輯積極邀稿的新寫手中，有不少是學院人士或有學術背景的人士，她／他們的寫作常帶有學院的氣息、理論術語的參雜。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批評其實是過去副刊所排斥的兩種特色的結合：一方面它處理「粗淺」的通俗流行話題，另一方面它有些學術或理論性。這兩個特色單獨存在時確實不符合副刊的形象與性質，但是當兩者結合在一起時，反而可以被副刊接納：

通俗流行的話題是市場的趨向與需要，而略帶學術理論性質來處理這些話題的方式可使副刊保持一定格調與水準的形象。新興的文化批評便是透過這樣的呈現方式被正當化的；即，它不像以往處理流行話題或通俗文化的道德說教方式或膚淺觀察方式，相反地，它採取一個批判角度——有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後現代主義等批判理論背景的角度——從而利用這些學術理論的智性形象來正當化了那些非文學、非高

等文化、非傳統副刊的社會政治文化批評。

更重要地，這個有批判理論背景的文化批評很方便地被人們和西方學術的「文化研究」聯結在一起，而文化研究則是在台灣最新登場的西方學術。這兩者的聯結主要是透過台灣文化批評的作者在其寫作中運用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論與符號資源，這更進一步正當化了文化批評。

有趣的是，一旦新的文化批評取得正當性並受到重視，突然間許多不同的寫作都被稱為「文化批評」。原本這個詞的核心意義是指對通俗文化或日常文化現象的批評，但是傳統上針對高等文化的批評（例如藝術評論或戲劇評論）現在也被冠以「文化批評」；同樣地，「文化批評」這個大傘之下還包括了某種行文風格或類型的電影評論、社會評論、媒體評論、政治評論，以及像都市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批評。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文化批評」的名稱或文類去涵蓋許多過去被認為不盡相同的事物，此一現象其實有背後的意義或趨勢：（1）在許多情況下，高等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區分日漸模糊；（2）媒體與文化的密切相關；（3）文化／媒體和社會－政治條件的不可分割。

我們可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上述三種趨勢：假如一部根據嚴肅文學改編拍攝的電影擺出具有高度政治爭議性的立場，並以藝術電影的形式製作，但卻藉著大眾媒體與文化工業的強力促銷，結果變成一部賣座電影與轟動的新聞事件。在這種情形下，會很難把對這部電影的批評（特別是那些不只談電影「本身」的批評）分類為影評、社會－政治批評、媒體批評或新聞評論等等，因為相對於這個例子的複雜情況，上述那些評論的名稱不是顯得太窄就是太特定。環繞著1989年電影「悲情城市」的眾多批評就是一個實際的例子。那些批評觸及的問題包括：影評本身的政治；台灣的歷史與政治；政府的文化政策；階級、性別與族群之關係；大眾媒體的性質與角色；電影工業的運作方式；人民記憶與傅柯（Foucault），等等。那些批評也不像傳統的影評刊登在報紙的影劇版上，反而它們都登在副刊及知識份子刊物上，並被

分類為「文化批評」⁷。

總之，一方面由於副刊本身、作者及讀者均出現變化，另一方面由於和西方最新學術流行的文化研究相聯結，文化批評因而受到尊重與歡迎。同時，「文化研究」這一名稱也適時地提供了一種方便利用的文類，亦即，這種文類突破傳統批評之分類（例如，使高等文化與通俗文化、政治與文化等的區分模糊、或使文字批評和媒體評論不分等等），廣泛地觸及一個現象的各種層面，而且不將一個問題或文本（text）的內容和它的脈絡分割開來。這個較無侷限、以「文化研究」為名稱的文類，正如前述，其實是1980年代後期台灣文化工業及副刊之演進，以及由台灣政經社會再結構所帶來之變化的結果；但是文化批評也試圖以整體的方式（holistically）去掌握這個演變的過程。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副刊與報紙的可能變化，以及這個變化對文化批評的可能影響。孟樊認為報禁解除後，傳統副刊的角色變得不重要了，吸引大眾的新聞事件甚至開始向原來副刊的版面侵襲（150），但同時也有許多新生的版面，像《中國時報》的寰宇版、寶島版、開卷版、意見橋版、藝文生活版等等，《聯合報》的繽紛版、鄉情版、讀書版、民意論壇版等等，而這些版面也有新副刊的影子（參見孟樊 152）。事實上，許多副刊作者或文化批評的作者也在上述版面以及家庭版或婦女版上寫稿或被訪談。報紙的這種變化，對文化批評未來的發展未嘗不是有利的，因為倘使文化批評能觸及更廣泛的社會生活與文化話題，文化批評便可以用更多的形式進入副刊以外的其他版面。雖然某些版面看來只提供資訊而不歡迎對資訊的解讀及分析，但是事實上，資訊並不是中立的，而是已經預設了特定的解讀與分析立場，故而文化批評的批判立場也可以發掘並串連那些未被注意或未被聯想在一

⁷ 上述有關「悲情城市」之文化批評已經編成一本書出版，即《新電影之死》，迷走與梁新華編。類似的電影／文化批評可參見吳其諺；至於高等文化與通俗文化區分不再的文化批評另一例子可參見張小虹，媒體與政治社會條件不可分的例子則可參見郭力昕，以及馮建三的《文化、賄賂、脫衣秀》及《資訊、錢、權》。

起的資訊。

文化批評的政治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文化批評之興起和台灣1980年代後期的政治社會轉變密切相關。以下我要更進一步地說明此一文化批評之政治，以及和真實政治的關係，我特別要指出那些能夠使文化批評與真實政治產生關係的特定條件。我的看法主要是說，文化左翼所進行的文化批評，其意識形態功能乃是倡言及串連多種新社會運動之各樣利益，然而此一意識形態功能有時候會和作為大眾媒體之副刊的角色相衝突，也有時候會和主要政黨的意識形態相衝突。

有關新文化批評在副刊出現的歷史契機已經被廣為討論，人們均同意新文化批評的興起主要並不是因為純文學的衰落，而是因為在後解嚴時代，台灣人民在面對戲劇性的轉型時迫切地需要對新情勢的理解，以及對新方向的自我定位。台灣人民不但尋求對現狀的分析，也尋求能把過去與未來連結在一起的敘事，透過對變化意義的歷史詮釋與未來展望，人們得以理解自身處境。但是這個自我理解也是自我利益與意志的表達，故而這個自我表達即是自我形成（**self-formation**）的過程，一個新主體位置的形成過程。新文化批評所提供的恰好即是對現狀的分析以及連結過去與未來的敘事，但卻以一個非文學且更直接的評論方式出現。當然，文化批評或副刊絕非唯一提供那樣的分析及敘事的地方，不過主要的政治黨派及有力的社會集團通常擁有更具效力的媒體資源（像電影、電視、報紙的政經版、教科書等等）去製造新的共識，以及召喚新的主體位置（參考何方 201-202，卡維波 64），副刊或知識份子刊物這類相對邊緣的媒體因而就成為邊緣團體、新社會運動、進步知識份子唯一可能的媒體資源。

副刊雖然相對地處於邊緣媒體的地位，但它畢竟是印刷大眾媒體的一部份，故而它對知識份子社群的影響不可低估。許多人甚至偏好副刊上的政治評論更甚於報紙政經版上的政治評論，因

為政經版的政治評論常常是「大名字」的政客、學者或代言人，正如傅大為所說「當一個大名字談一個合時的大問題時，將一種立場『站出來』的效果往往遠大於其文章的內容」（84）。正是由於表明立場才是這種評論的主要目的，所以其內容就不可能有什麼驚人之處，往往只是原本立場的重述。（而政治勢力的表明立場即是表明自身的「健在」，故而是維持與運用其權力的一種方式。）相對地，許多副刊的文化批評作者一方面不隸屬於特定政治黨派，另一方面則在論點上銳意求新，力圖突破現有的主流說法（這種銳意求新當然是知識份子渴求新奇與原創性的結果，但是副刊本身也制度性地鼓勵並要求具有新意的文字），所以即使同樣是政論文章，副刊的文化批評也比那些政經版上了無新意的政治評論要有趣。此外由於副刊文化批評的銳意求新，不同於主流的說法，使之較容易和被主流政治排斥的邊緣團體與社會運動申誦。

新文化批評的作者們，特別是文化左翼，經常強調台灣社會的多元複雜性無法從單一的（即，政治的）觀點去理解；因此她／他們的批評不但常涵蓋了極廣泛的或傳統知識份子較少觸及的「邊緣」話題，而且還從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性的或性別的角度出發，有別於主流觀點所呈現的化約式、簡單化了的台灣圖象。

以上所描寫的新文化批評對知識份子社群的可能影響，絕不是說文化左翼主宰了副刊的文化景觀；相反的，文化左翼和副刊（大眾媒體）的結合並不是很美滿的。首先，這是因為不論副刊如何相對地邊緣，但它還是不同力量角逐鬥爭的場域，而文化左翼只是角逐的力量之一，副刊的文化景觀不可能被文化左翼所主宰。其次，作為大眾媒體的副刊，必須依照大眾媒體的邏輯以及市場的邏輯來運作，故而副刊本身可能的表現與功能總是受限制的，並且會和文化左翼偶而挑戰市場或大眾媒體邏輯之企圖相衝突。再者，文化左翼的內部除了較傾向社會運動的立場外也沒有清楚的共識，而自由派或反對黨知識份子也寫作許多文化批評

（他們和文化左翼的區別有時只是文化批評中使用的修辭、理論資源或激進的態度不同而已），所以新文化批評的視角與進路可說是相當多元，而非受特定立場所主宰。

不過在文化批評的論述之形成上，文化左翼畢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文化左翼常常對那些看來中立、無立場的文化批評重新詮釋，並將之放入一個較激進的脈絡，在這樣的努力下，文化左翼所作的文化批評可被看作社會運動參與政治的另一種新的方式。

這又把我們帶回到文化政治與真實政治的複雜關係此一話題。為了要充分理解新文化批評的政治效果，我們必須約略考察台灣的反對政治與邊緣社會集團的關係。在此，我欲藉這個考察說明的問題是：為什麼台灣的文化左翼要搞文化批評，而不是（例如）政治批評？如果我們明白一群人是因為搞某類文化批評才成為文化左翼，而不是因為她／他們是文化左翼才搞文化批評的話，上述那個問題也其實就是在探究搞文化批評的政治條件。

所謂「邊緣社會集團」，指的是在當前政治舞台的權力操作中被排除在外的、甚至在反對陣營裡的權力操作中也屈居下風的。台灣的新社會運動即是這樣的邊緣社會集團，**它們多數被包攝裹挾在以國家認同為優先目標的獨立運動中**，而社會運動議題則屬次要。換句話說，邊緣社會集團可說是雙重的邊緣：它們的宗旨（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環境保護主義等等）一方面並未在整個社會中有充分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政治反對運動中也被看作次要或甚至分化性的（所謂「政治反對運動」，是廣泛的反對政治，雖然實質上是反國民黨，但是不等於政治反對黨）。如果這些邊緣社會集團和一個有力的政黨結盟，後者不但可提供政治代理，也有較多的資源——它可提供組織上、動員上、正當性上的協助，也提供政治保護以免國家的任意迫害；不過這也意味著這些社會運動團體的自主空間有限，其力量的發展將是依賴性地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社會運動若能串連成反對運動內的一個派系，則可以透過集體議價而促進它們的利益或使它們在反

對政黨內有較大的發言權。

不過，邊緣社會集團需要一個或一些敘事來將它們串連成政治反對運動內部的一個派系。這個（些）敘事則須有以下的特性：

第一，這個敘事不能是個鉅大的、後設性敘事以至於抹殺了個別社運的特殊性。相反地，它必須是一種局部的敘事，這樣才容許個別社運能尋找到各自的自主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對社會各層面所進行之文化批評正提供了一種能將邊緣社會集團之共同利益倡言出來的局部敘事，而其方式則是一件件地（*piecemeal*）、個例的（*case by case*）、具體地的方式——而不是從一個後設層次的、結構性或全面的方式來倡言不同運動之共同利益——因而有助於不同團體串連為一團結性聯盟⁸。局部敘事也往往能抗拒「台灣獨立優先」之類的鉅大敘事，促進因事件而形成的共同抗爭不因統獨問題而分裂。

第二，這個敘事雖然會使用政治反對運動的許多修辭、符號或教條，但是這些修辭或教條均會被放入一個新脈絡中被重新詮釋，以備用來正當化社運團體自己的目標或利益。在這個重新詮釋的活動中，社會運動之間彼此的平等，以及社運在反抗統治集團之政治宰制方面的重要性（亦即，社運在整個政治反對運動中的重要性）均會被強調。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再詮釋的活動必須

8 1991年台灣的反戰文化評論（下詳）即是從一件具體議題——反戰——入手來談弱勢邊緣社運團體的結盟。不過另一方面，這些團體的結盟好像也須要一種涵蓋面較廣、不是*case by case*的說詞來召喚這些不同的社運主體以自主平等的方式（而非某運動當領導的方式）來結盟，並且用來當作社運結盟的一個符號標誌，或甚至用來串連各種文化批評，將它們放入一個較激進的、政治性的脈絡。台灣的文化左翼大抵上提供了三種這樣涵蓋而較廣的說詞：人民民主、邊緣戰鬥與社運觀點。（這裡社運觀點的「觀點」*standpoint*的意義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可參見Nancy Hartsock的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andra Harding (ed.), *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7. 157-180.）機器戰警在《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中則認為人民民主、邊緣戰鬥、社運觀點這三者在當前台灣的脈絡裡是相等的，即，不是本質上相同，而是在差異關係中相同（117-120, 188, 408-409）。但是像人民民主、社運觀點這類說法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是不是另一種後設性質的鉅大敘事（*grand narrative*）？機器戰警在上書中主張人民民主只是運動倫理或常識（108），並且很詳細地為這樣的主張辯護（265-274）。

以新穎銳利具吸引力的知識形式加以包裝，亦即，所談的這個敘事尚必須站在新思潮戰線的最前端、接合流行前衛的西方思潮（例如接合西方的文化研究），這樣才能成功地在政治反對運動內爭取知識上的領導權。

第三，為了保持社會運動個別的認同，有時會無可避免地批評政治運動團體的策略、路線、政策等等。但是將社運串連起來的敘事及對政運團體可能的批評，卻不能是一個直接了當、有清楚明白的政治議程的政治批評。首先這是因為社運本身就被包攝在政治運動之下，進行直接且清楚的、有自己的政治議程之批評是不恰當的。（自主弱勢的社運團體多不會明白地提出其政治議程，除非是被迫表態；相反地，政運團體出於自身利益則常要求社運清楚表明自身的政治議程與目標）。此外，更實際地來說，由於公共論壇（public sphere）基本上是由有力的社會—政治力量所主導，社運因此也不太可能有空間去進行上述那種政治批評。更直接地說，文化左翼所依附的副刊或雜誌不是傾向反對黨就是自由派的媒體，對反對政治運動的直接政治批評將難在這樣媒體條件下發展⁹。因此，社運的政治利益經常只能藉著文化批評來表達，這種文化批評實際上扮演著政治批評的角色。

上述這種以文化批評來置換（displace）政治批評的狀況，可以用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蓬勃的文化批評為例¹⁰。當時台灣的執政黨與反對黨對波灣戰爭的基本態度仍是一貫親美的；除了少數

⁹ 事實上，在副刊以外的版面，不論是主流報紙或像自立晚報這種反對型報紙，其言論自由的程度均有一定的限度，較激烈的言論出線機會不大。馮建三便曾指出「如果就媒體的標準而言，批判性知識份子的言論激化（比如，不再只是就統獨而爭論，而是進入階級問題的討論），則不但守成媒介對其報導，將會減少，恐怕非主流媒介的報導應該也會減少」（80）。文化左翼對政治反對運動的批評，通常是針對其傾資本家路線或傾國家機器路線，故而多屬激烈言論。馮建三還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亦即，自立晚報在外稿上給予國家機器及資本家的空間遠超過兩大報（詳參馮建三對此現象的分析，60-63。）

¹⁰ 這些文化批評的大部份均已由成令方編成《戰爭·文化·國家機器》一書。有趣的是，Douglas Kellner在談及文化研究與政治的關係時也是以波斯灣戰爭為例。參見 Douglas Kellner，〈邁向一個多元觀點的文化研究〉，邱炫元譯，收入《Cultural Studies：內爆麥當奴》，陳光興、楊明敏編，台北：島嶼邊緣雜誌社，1992，頁67-88。

例外，許多反對黨或獨立運動的知識份子均讚賞美國在中東的作為。台灣的電視與報紙則充斥著西方或美國觀點的新聞報導。不過就在同時，也有另一股有關波灣戰爭的說法，明顯地和這股擁美的戰爭狂熱矛盾，這些反戰的說法是在報紙上形成的，特別是透過副刊的文化批評形成的。在這之中，文化左翼的反戰文化評論則企圖把反戰和台灣的社會運動之目標串連起來，並強調社運的國際連線或跨國的結盟之重要性（參看成令方）。像這樣的觀點，直接挑戰了以國家機器為主體的民族主義立場以及「國家主權優先與無上」此一立場，而後面這二種立場則是台灣政治運動的主流立場¹¹。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左翼的反戰文化評論在實際上是對執政黨與反對黨這些主流路線的一種政治批評。

如果上述對文化批評的政治之分析基本上成立，那麼向陽對副刊的文化政治之觀察似乎是不完整及過度簡化的。向陽認為自1980年代始，台灣報紙副刊的意識形態對立已不再是兩大報副刊的鬥爭，「而是『本土的』、『台灣的』副刊與『中國的』、『兩岸的』副刊的對立。在這個層面上，兩個類型的副刊，作為大眾傳媒，可是一點也不含糊地進行著文化霸業的爭奪」（192）。向陽另外還說：「1980年代臺灣報紙副刊的此一文化霸權建構固然是『文化』的構圖，同時也是相應於整個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反宰制結構的一環。它的一面是文化的，另一面同時也是政治的」（193）。向陽後面這個對副刊的文化／政治雙重構造性質的描述大抵上是正確的，但是向陽卻簡單地把文化霸權的鬥爭粗糙地化約成「台灣副刊」與「中國副刊」的對立。當向陽將副刊上眾多有關性別、階級與其他社會文化議題化約為單一的「台灣vs.中國」時，他顯然沒有設想到副刊的多元面貌。更有甚者，向陽雖然列舉了《自立晚報》、《自由時報》、《民

11 在這個主流立場下，（1）社運議題被看成在位階上低於國家認同問題，而且（2）社運問題只能或只應當透過本國的國家機器來作制度上的解決（這蘊涵著社運應當效忠於本國）。文化左翼批判了上述看法：針對（1），文化左翼提出了「反對統獨優先論」；針對（2），則提出了「新國際在地主義」（參見陳光興），及「非國家（機器）主義」（a-statist）（參看傅大為）。

眾日報》、《台灣時報》的副刊為「台灣副刊」，但這並不足以說明為何其他副刊不是「台灣的」而是「中國的」，或為何其他副刊上的文學、評論等不是「台灣的」。反過來說，為什麼所列舉的四個副刊即是「台灣的」？或只有它們才是「台灣的」？以及「台灣／中國」的二元對立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上？是不是建立在對台灣做本質主義式定義的基礎上¹²？凡此種種，均是尚待澄清的問題。像向陽這種化約的作法，將副刊上的眾多言談之間的差異泯滅，事實上也泯滅了人們對抗不同宰制之鬥爭的異質性。而這種泯滅、化約或壓抑乃是強勢政治力量的一種「權力技術」，用以凝聚及置換眾多不同的敵意，故而亦是一種集中權力的方式（參看機器戰警 113-114，100-101）。

可想而知的，文化左翼對社運所採取的立場不會受到主要政治勢力的歡迎。在有關於社運與政運的關係之辯論中，以及有關「人民民主」、「邊緣戰鬥」、「新國際在地主義」等等爭議中，文化左翼遭遇了自由派、「老左派」、統派與（特別是那些主張獨立優先及獨立是超階級／性別的）獨派之挑戰（參看陳光興、傅大為、機器戰警等書）。總之，左翼取向的文化批評在副刊上的出現招致了許多不滿甚至抵制。

不但文化左翼的文化批評招致抵制，一般的文化批評由於其可能的顛覆性有時也遭遇抵制及不滿。這裡只舉一個例子以說明這種情況。當文化批評逐漸流行後，《中國時報》決定以全版的「文化觀察」每周一次刊登這種新文類；正如本文的第二節所指出的，由於文化批評處理的是一般讀者感興趣的話題，但又不失智性的處理方式，所以不會被評為庸俗或媚俗，因此《中國時報》的「文化觀察」頗受好評與歡迎。但是也由於文化批評對社會文化現象的非常識之智性——通常帶有顛覆性——解讀方式，「文化觀察」版未能生存很久，特別是在它刊登了幾篇包括筆者在內的有關「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文化批評後。（中國青年反共

¹² 有關這種本質主義式的「台灣」定義之意識形態功能，可參看機器戰警 471；以及署名為「台灣人」在《島嶼邊緣》雜誌第七期（1993）所發表之〈假台灣人：台灣的第五大族群〉對此問題的有趣敘述。

救國團後來在其《團務通訊》上以全面出擊的方式來反駁《中國時報》「文化觀察」版的這幾篇文章，並在相關報紙上也發表類似的反擊評論）。從這個例子，我們可看到文化批評的政治的另一層面。

以上本節所描述的就是文化批評所處的微妙且困難的處境。有許多勢力希望文化批評能變得較「文化」而且較為泰然或「休閒性」，亦即，較少政治性及爭議性。不過也有勢力雖不反對政治化的文化評論，但是卻不樂意看到文化批評去串誣社運的利益。在這樣的複雜狀況下，副刊或雜誌中的文化批評之未來尚有待觀察。

作為文化研究的應用哲學

文化批評在台灣除了在報紙副刊的成長外，也同時透過它與文化研究這一學術的聯結而被強化。自1990年開始，由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共同主辦「文化批判研討會」按期舉行。另外，文化研究的大型國際會議（例如1992年清華大學舉辦的Trajectories: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ist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課程、以及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都開始紛紛出現，以文化研究為範圍的碩士論文也有不少。這些發展對於豐富文化批評的論述均頗有影響。

很明顯地，學院的文化研究及媒體上的文化批評可以互補互利，例如兩者可以互為對方在生產論述時的資源。就某一程度而言，台灣的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之現狀正是這種互補的情況（參看朱恩伶的〈全球文化研究總覽〉與〈台灣文化論述點將錄〉）。故而在學院內外的知識份子有某種合作，同時學院與媒體也有一定的聯繫。

不過學院的文化研究與媒體的文化批評之互補性，並不意味兩者相同。蔡源煌教授甚至還斷言兩者之間有一清楚的區分（20）。當然這兩者之間確有差異存在；但是我們不能從這個差異推斷學院做的文化研究比較優越或有價值。這種虛假的優越感

往往強化了學院與非學院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

在目前，學院的文化研究與非學院的文化批評在實質上的差異主要是前者較偏重文化研究的理論層面，特別是根據西方社會及文化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而後者則將焦點完全放在台灣社會及文化。這個現象可能和文化研究在台灣主要的制度性支持者及引進者是英文系的學者有關；因為台灣的英文系不能和美國的英文系一樣研究本地的文化，台灣的英文系過去多被設定為對英美文學或英美文化的研究，而如果台灣的英文系進行對台灣本土社會文化的研究，很可能被視為偏離科系的訓練，故而學院的文化研究（很多都是英文系在此從事的）常偏重理論層面的探討，或者為了接合西方理論而顯得生硬地過度理論化了本土的文化現象。

不論台灣的英文系將來是否能完全正當地做本土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基地都必須更寬廣以便能拓展學院內的文化研究。這意味著文化研究也應在英美文學以及傳播研究以外的學科進行（傳播科系常是台灣文化研究的另一學院支持者），而在此我將建議哲學系或哲學研究機構也可以從應用哲學的角度進行文化研究。限於篇幅，以下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可能不會很得當，我的意圖只是讓人們意識到在台灣進行作為應用哲學之文化研究的可能性，故而我只會以較簡單的方式處理像「應用哲學」這種不簡單的觀念。

西方的應用哲學，特別在英語系國家，多被等同於應用倫理學，並且具有分析哲學此一哲學傳統的背景。「應用哲學」的標準定義可說是「哲學性地涉入實際生活的問題，尤其是那些有道德意涵的問題，而且是那些能夠被深刻地概念性理解以及被批判性地分析（涉及之論證）所闡明的問題」（Almond and Hill 1）。換句話說，應用哲學的這個觀念就是把最抽象的學科——哲學，以及最實際、最不抽象的活動——應用，兩者結合起來（Almond and Hill 1）。（對這種「應用哲學」是「理論哲學之應用」觀點，我有不同看法，下面會提到。

就像西方學說在進口與適應的過程裡所常發生的那樣，西方

哲學（包括了西方的應用哲學）的原始特色可能因為台灣的知識生產條件而被轉化或改變。例如，西方的某個理論辯論或許源起於兩個哲學社群的利益衝突，或許對西方當代或當地的社會政治事務有深遠的蘊涵；但是在第三世界，同樣的這個西方理論辯論卻可能因為不同的動機或不同後果而被賦予不同於西方的面貌，並且朝不同的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在西方或許是應用或實際的思維，但在台灣則否。

即以應用哲學為例，在西方應用哲學界辯論得十分熱烈之話題，像墮胎、安樂死、核武競賽、動物解放、種族歧視主義、對優勢者的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即為了保障黑人或婦女，因而可能造成對白人或男性的歧視）、生物醫學倫理、同性戀……等等，其實還不是會引起台灣公眾興趣之實際問題。縱使某些問題會引起興趣，也和西方關懷的角度完全不同；例如，在墮胎問題上，西方關懷的是胎兒生命權與女人身體自主權的衝突，但是台灣則關心墮胎所涉及之性道德問題以及胎兒性別問題（即，夫妻若發現胎兒為女性，則往往墮胎以等待另一男性胎兒）。這種關懷的面向和西方很不相同，因此如果台灣的應用哲學力圖和西方的應用倫理學在範圍與進路上雷同，那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應用」哲學。

如果台灣的應用哲學希望能貼切地針對本地的實際關懷，它至少須要處理一些不同的議題、現象或層面，特別是由於（1）傳統文化的解體、（2）急速卻不平衡的經濟發展、（3）新社會運動興起，而導致的一些猝然出現的現象、議題與層面。假如台灣的應用哲學可以（也似乎應該）關注一些與西方應用倫理學不同的議題、現象等，那麼台灣的應用哲學也沒有什麼理由非以分析哲學為其理論背景不可，它也可以援引其他哲學傳統以為其理論背景。同樣的，台灣的應用哲學可以採用一個很不同的理論進路，例如，純粹倫理學以外的其他理論進路，而仍保留其「應用」之性格。

這裡的論點不是說台灣的哲學家不應該去做應用倫理學（相

反的，他們當然應該去做），而是說我們可以**重新設想**「**應用哲學**」，不將之視為理論哲學的應用，而是一門新的（哲學）領域。這個想法來自將「應用倫理學」視為獨立於倫理學的新領域、而不是倫理學的應用，就像「應用文」不是什麼文類的應用，應用文本身就是一種文類（詳參本書的〈試論美國的應用倫理學的興起條件〉一文）。既然應用哲學不必然是理論哲學的應用，那麼台灣的應用哲學家還可以有另外一種做法，例如，從事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

不過，台灣哲學家不能只因為文化研究處理實際或和社會相關的議題，就要來從事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另外一些考量也有利於哲學家從事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這個建議。

首先，從事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在台灣的哲學研究狀況下應算是很自然的。畢竟至目前為止，文化研究在台灣學院中不但頗為理論性地涉及許多抽象觀念，而且這些觀念基本上來自（廣義的）歐陸哲學的背景；而相對於分析哲學，歐陸哲學的傳統比較受到台灣的歡迎和理解，由於這個因素，文化研究的性質被視為具有相當的哲學性。故而如果台灣的哲學家在從事文化研究時儘量從被視為正式的哲學理論援引論述資源，他們會有很好的機會去正當化他們的文化研究。

更有甚者，台灣哲學社群之主流可能覺得可以接受「從事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這個想法，因為這個社群向來十分關懷文化議題，以及哲學與文化的關係。在哲學社群中流行的說法是：哲學應當和解決文化問題相關，而且應當對文化有實際的影響。這個流行說法似乎由來已久且甚少遭到反對，在最近創刊的一本哲學雜誌之發刊詞中還能聽到對這種流行說法的肯定：

哲學不能只是少數人的奢侈品，不能只是某些人在觀念與玄想領域的逃避。哲學必須進入社會，進入文化，進入生活。大體說來，我們可以正確地指出：「文化若無哲學則盲，哲學若離文化則空。」（沈清松 5-6）

我相信這段引文反映了主流哲學社群一般的意見及情懷。

此外，中國哲學的研究者向來強調哲學在文化中的功能，以及文化在哲學中的角色，所以，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可以為那些側重中國哲學進路的哲學家和那些偏重西方哲學進路的哲學家提供一個對話的場所。當然，不同哲學家對文化或文化研究的取向、進路、關懷及目的均可能不同，但是這並不能（也不應該）成為不同哲學傳統彼此對話並彼此滋潤之障礙。同樣的，當哲學家開始從事作為應用哲學之文化研究，他們也會無可避免地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產生對話，因為文化研究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其他學科所提供之理論與事實研究。由於文化研究原來就是個跨科系、跨領域的研究，哲學很可以在這種情況下扮演一個幫助各領域或各學科溝通的角色。

另一個可能說服主流哲學社群接受文化研究的理由則和哲學近年來的邊緣角色有關。在台灣迅速社會變遷中，許多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均能向社會大眾提供有用的論述，使人們能理解當前的發展與變動；這些學科也同時提供了針對國家機器及各種政治力量的意識形態資源。相對地，哲學家則被排除在這意識形態及社會理解的提供者之外，沒有他們的發言位置¹³。如果哲學家們能夠從事文化研究，甚至和大眾媒體中的文化批評互補，那麼即可能為哲學家提供一個重要的管道或媒體以及發言位置。至少從事文化研究可以是哲學家傳遞其觀念、並藉著提供意識形態資源來投射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徑。從最現實的層面來說，哲學系學生可以因文化研究而有助其在文化工業與媒體中就業。

對那些研究西方哲學的台灣哲學家而言，重新在社會上取得發言位置尚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向來就是一種「依賴的知識」（dependent knowledge）¹⁴，是在對西方問題

¹³ 雖然有某些個別的哲學家寫了一些通俗著作，教導青年人如何過道德的生活，但是這些著作的內容並沒有被專業哲學建制化（例如被專業哲學論文當作引用資料或被當作教科書等）。因此，這些哲學家是以智者而非專業哲學家的身分透過那些通俗著作來發揮影響力的。

¹⁴ 有關這個觀念詳參Goonatilake。

的一種抽象且毫無脈絡（或西方脈絡）的討論方式下生產出的知識。如果台灣的哲學家能夠從事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那麼進口的西方哲學就有機會被放在本地的脈絡與關懷中去詮釋，並且連結起具體的本土問題，甚至可能以台灣特有的角度被吸收進來。

希望以上簡短的評論已經為台灣應用哲學家從事文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由。也許本篇論文的最重要功能即是在本文的呈現中例示一種作為應用哲學的文化研究吧。

引用書目

中文部份

- 《文訊》編輯室，〈各報副刊歷任主編名錄：民國34年-75年〉，《文訊》22（1986）：89-104。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務通訊》511，台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90。
- 卡維波，〈一切為誰的明天？〉，《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迷走，梁新華編，台北：唐山，1991。60-65。
- 成令方（編），《戰爭·文化·國家機器》，台北：唐山，1992。
- 向陽，〈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以台灣報紙副刊之發展過程及其時代背景為場域〉，《聯合文學》96（1992）：176-196。
- 朱恩伶，〈台灣文化論述點將錄〉，《中國時報》，1992年7月24日，34版。
- ，〈全球文化研究導覽〉，《中國時報》，1992年7月17日，34版。
- 汪芸，〈台灣的中產階級：第二疊報紙的忠實讀者〉，《中國時報》1993年7月8日，人間副刊。
- 何方，〈傅柯、電影與人民記憶：兼談《香焦天堂》等台灣電影〉，迷走與梁新華190-207。
- 吳其諺，〈低度開發的回憶：一種異類影評〉，台北：唐山1993。
- 金恆煒，〈副刊的社會參與〉，《文訊》21（1985）：123-127。
- 沈清松，〈發刊詞〉，《哲學雜誌》1（1992）：4-6。
- 孟樊，《影像社會：訊息的解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0。
- 孟樊、林耀德（編），《世紀末偏航：八〇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0。
- 林耀德，〈「鳥瞰」文學副刊〉，林耀德、孟樊，369-402。
- ，〈「聯副」四十年〉，《聯合文學》83（1991）：11-19。
- 林耀德、孟樊（編），《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台北：時

- 報文化出版 1992。
- 迷走，《多重戰線》，台北：唐山，1991。
- 迷走、梁新華（編），《新電影之死：從「一切為明天」到「悲情城市」》，台北：唐山，1991。
- 張小虹，《後現代女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
- 郭力昕，《電視批評與媒體觀察》，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0。
- 陳光興，《媒體 / 文化批評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台北：唐山，1992。
- 傅大為，《知識、權力與女人》，台北：自立晚報，1993。
- 〈報紙副刊何處去？：談談副刊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聯合報》，1977年10月5日、6日，8版。
- 馮建三，《大眾媒介的編制外工作者之研究：以台灣報紙的學院知識份子撰稿者為例，1951-1991》，（第一階段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1993。
- ，《文化、賄賂、脫衣秀：解讀資本主義的傳播符碼》，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2。
- ，《資訊、錢、權：媒體文化的政治經濟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2。
- 鄭貞銘，〈副刊編輯的素養〉，《文訊》21（1985），65-71。
- 蔡源煌，《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1。
- 機器戰警，《台灣的新反對運動》，台北：唐山，1991。

英文部份

- Almond, Breda and Donald Hill. "Introduction." *Applied Philosophy: Morals and Metaphysics in Contemporary Debate*. Eds. Breda Almond and Donald Hill. London: Routledge, 1991. 1-6.
- Goonatilake, Susantha. *Aborted Discovery: Science and Creativit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Zed Press, 1984.
- Rorty, Richard.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Essays 1972-1980*.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2.
-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Too Far In? Too Far Out?" *Dissent* 38.4 (1991): 483-90.
-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Philosophical Papers*. Oxford: Cambridge UP, 1990.